TPASS: 官僚極大預算、政客收買選票的爛政策

陳國樑

政大財政系教授暨系主任/政大財稅研究中心主任

04 Aug. '24

財政學的第一堂課,或是其他介紹財政學的座談與演講,面對台下的學生與聽眾, 我試著說服大家的是,財政學不是空泛的理論或與現實脫節的模型;數學符號、 方程式與複雜的圖形,都在述說著生活中,個人與公共部門的連結、牽絆或糾葛。

財政學是思索與討論個人日常生活中,與政府部門相關議題的一門學問。以下藉著分享自己生活中的兩個片段,談談 TPASS 通勤月票政策。

其一,某日某場合與某財政部高層長官同台,等待開場的閒聊間,話題轉到通勤 月票政策,長官表示,TPASS的效果很好,很多財政部同仁從基隆或桃園來上班, 每個月交通費省下了一大筆;臺北與北區國稅局,也有不少第一線稅務員受惠。

其二,周末,太太見我又抱頭伏案,為了每周的稿件,而與鍵盤和螢幕廝殺;一時間好奇問我在寫什麼,回答:「TPASS 通勤月票…」,話都還沒說完,太太隨即勸我打消念頭,因為她一直是通勤月票的忠實使用者,覺得這麼便宜的月票真的很好用,我又沒有使用月票不懂,不應該妄加非議。

其實,不論是在財政部、臺北與北區國稅局上班的公務員,又或筆者太太的情形, 正說明了 TPASS 通勤月票政策的不當。

TPASS 通勤月票政策,原為兩年前九合一大選,民進與國民兩黨,北北基桃市長候選人政見交鋒之所在,為了選舉造勢的成分居多,並沒有審慎的規畫。讓人跌破眼鏡的是,通勤月票政策竟然在選戰落幕後,發展成全國性政策。

交通部搭總經費三千八百億元之「疫後特別預算」的順風車,提出兩百億元的通勤月票方案。根據交通部路政司規畫簡報,政策目的在:一、「提升公共運輸運量」;二、「減輕通勤負擔」;但在既沒有進行成本效益評估、也沒有建立任何關鍵績效指標的情形下,決策的政治考慮凌駕專業。

就提升公共運輸運量而言,不論是上述的公務員們或筆者太太,本來就會使用公共運輸通勤,政府如何再以補貼的方式,「創造」出另外使用公共運輸通勤的誘因來提升運量?難不成因為有廉價通勤月票,所以星期六、日狂加班?無法造成行為模式改變的補貼,是資源錯誤的配置與浪費,有害經濟效率,造成社會無謂損失。

就減輕通勤負擔而言,文中所言若干人等,沒有補貼的票價並非負擔不起,政府 資源應優先考慮重分配給經濟弱勢族群,「使用通勤月票」並不等於「經濟弱勢」, 咨意撒幣補貼所有月票使用者,反而有害社會分配公平。

因此,從財政學的規範面看問題,TPASS 通勤月票政策,既不效率、亦不公平,是一個不該被極大化社會福利為目標的政府所考慮之政策。既然如此,該如何看待交通部的決定?甚至不斷對外表示,要爭取將 TPASS 通勤月票補貼「常態化」;言下之意,在「燒完」了兩百億元來自特別預算的經費後,要行政院每年繼續給九十億元起跳的預算。

在財政學的實證面,公共選擇理論有一說,官僚體系以極大化機關部門的預算為目標,以增加其權力、聲望和影響力,被稱之為「預算極大化假說」(Budget Maximization Hypothesis),由經濟學家威廉·尼斯坎南(William Niskanen)所提出。又,不少理論也指出,政黨與政客會透過增加公共支出或提供特定福利來「收買選票」(vote buying),以吸引選民的支持。

按此,TPASS 通勤月票政策,不正是這麼一個可以擴增官僚預算,又可以拿來收買民心的策略。只要讓民眾少付幾個車票錢,眾人額手稱慶、善頌善禱,自然會有選票支持;所謂政策目標,不過就是宣傳與包裝,倘若還認真去評估政策效果,無疑是庸人自擾。

前交通部長王國材,任內對於推對 TPASS 通勤月票政策不遺餘力,此刻正處於中華郵政董事長「候任」的狀態中;曾經感嘆表示:「交通部很多事情被罵,只有 TPASS 月票政策都是被稱讚。」此語道盡時下百官心態一不做「應該做」的決策,做「會被稱讚」的決策!嗚呼哀哉。